

我所認識的中華民國歷任總統

——王作榮先生訪談紀錄*

許瑞浩、薛月順訪問整理**

壹、中華民國四任總統的決策模式

在談中華民國歷任總統之前，想先談談我對治史的看法。我讀過經濟系，也讀過政治系，但我真正的興趣是歷史，我很熟悉中國歷史，只是沒有受過歷史方面的專業訓練。中央研究院黃彰健院士、王聿均研究員都是我大學時代的同期好友。黃彰健已經在去（2009）年底過世了，在中央大學唸書時，他常常跑來我們寢室，雖然天氣轉寒，我們還是穿著短褲、背心，躺在床上聊天，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那時的樣子。我覺得做為一個歷史學家，態度要公正，不要把意識型態帶入歷史研究當中，要尊重歷史事實，唯有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才能成為真正的史家。

我認識四位總統，第一位是老總統蔣中正，第二位是他的兒子蔣經國，第三位是嚴家淦，最後是李登輝。經過長年相處，我對這四位總統的觀感，其實和一般人的印象不同。

我和後三任總統的關係很差。老總統說我是他的學生，而且他高高在



王作榮先生近照（王作榮先生提供）

上，雙方當然不會生怨結仇，但也談不上什麼關係。至於其他三位，我統統得罪了，包括李登輝在內，他們都壓抑過我。這些陳年往事，現在回想起來都已無所謂了，人生本來就是因誤會而起。

一、蔣中正老總統

老總統蔣中正是我的大學校長，

* 本文係本館許瑞浩與薛月順協修於民國99年3月25日在臺北王作榮先生自宅進行訪問之紀錄稿。

** 許瑞浩、薛月順為修纂處協修。

我在中央大學唸書時，他兼任校長，我的畢業文憑上面蓋的章就是「校長蔣中正」。¹當時一般學生並不歡迎他，覺得一個軍人哪有資格當我們學校的校長？但是蔣中正總統非常欣賞我，也非常瞭解我。

外界批評老總統獨裁、威權，平時的威儀也令人心生敬畏，但事實並非如此。就像我剛才說的，史家的態度要公正，不能一筆抹煞蔣中正對於臺灣的貢獻，只批評他獨裁、專制和製造白色恐怖。他對臺灣貢獻非常大，在我的一些著作中都有提到。

你們知道老總統是如何做決策的嗎？老總統非常用功，十分注意平常的新聞報導和報章雜誌的消息。他自認是軍事專家，也自認對黨務很內行，但對財經問題則是一竅不通，看不懂也聽不懂。所以在裁奪任何重大財經政策之前，他會先充分瞭解正反兩方的意見。由於事前他對正反兩方的專業看法都不是很清楚，就把兩方的人全部找來開會，通常一邊是學者、專家，一邊是政府官員。他要雙方都表達意見，自己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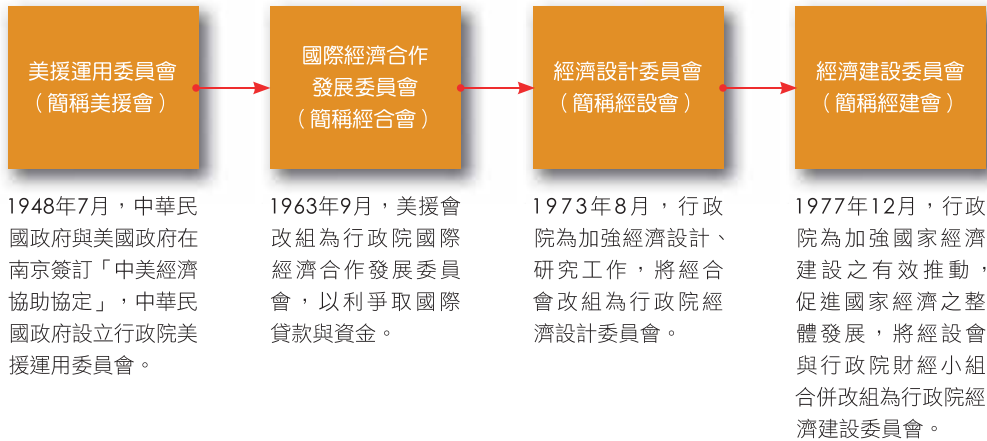
在旁邊聽，並不表示任何意見。看到老總統在座，雙方人馬當然是拼命地你來我往，互相批評對方政策的缺點和闡述己方政策的優點。等到雙方辯論結束，老總統會宣布休息半小時或一小時，然後獨自一人退席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仔細思考。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再出來表示：「你們剛才講的，我都聽了，也考慮過了，我現在做決定。」老總統的最後決議，當然沒有人敢再有異議。由此可見，老總統其實懂得接納別人的意見，並不像外界所說的獨裁、自行其是。這是我所知道的老總統決策模式之一。

另外一種決策模式是，老總統會找幾位親信及所信任的財經官員前來逐一進行報告和釐清意見。當時他最信任的人是嚴家淦、俞鴻鈞、尹仲容、楊繼曾和徐柏園等人。等大家報告結束之後，他會發言，針對不懂的地方提出問題，直到全部內容都弄清楚為止。有了全盤瞭解之後，老總統才會做決定。當時我們只是小蘿蔔頭，根本沒有資格參加，只聽過那些與會者的轉述。我們替這種決策模式取了一個名字，稱為「御前會議」。每次碰到重大財經問題時，幕僚必須事先準備「御前會議」的資料，我就是其中的負責人之一。

1953年，我擔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

¹ 王作榮先生於1938年以第一志願進入中央大學政治系，1940年轉經濟系，1943年畢業。1943年2月至1944年7月，蔣中正以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任中央大學校長。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功能調整改組歷程



員會（以下簡稱「經安會」）²工業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工業委員會」）的專門委員；1958年，工業委員會併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美援會」）³；1963年，美援會再改組為行政

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合會」）。在改組以前，我是美援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合會正式編組之後，我擔任第三處處長。無論組織怎麼調整，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負責在開會前準備相關資料。因為我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資料掌握得最清楚，所以由我負責準備開會資料。資料備妥之後，他們就拿去向總統報告，雙方進行充分溝通和研究，最後由總統定奪。至於最後做了什麼決定，我們並不清楚，參加會議的長官也不會告訴我們這些小蘿蔔頭。

2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ESB），簡稱「經安會」，1953年7月行政院整併各財經機關，改組行政院財政經濟小組為經安會，使成為中央與地方財經政策的设计審議和協調聯繫的臨時性機構。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長兼任（俞鴻鈞、嚴家淦、陳誠先後任之），各部會及相關單位主管為委員。下設四個組、工業發展委員會及秘書處。四組分掌貨幣金融與外匯貿易管理事宜、美援物資與相對基金運用事宜、財政與稅務相關事宜、農林漁業政策設計審議事宜，1956年1月增設第五組，主管物價政策。工業發展委員會主管工業政策設計審議與推動工業建設，是經安會最重要的單位。

3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簡稱「美援會」，1948年7月成立，負責執行美援相關業務，由行政院長兼任主任委員（政府遷臺後閻錫山、陳誠、俞鴻鈞、嚴家淦先後任之），副主任委

員為實際的主事者，1963年9月由於美援即將停止等原因，改組為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IECD）。

二、嚴家淦總統

參加「御前會議」的這些決策高層當中，老總統最喜歡的人就是嚴家淦。嚴家淦是學化學出身的，對財經問題也是外行，但他真的很聰明，在老總統開會前，會事先消化資料，然後用自己的話清楚明白地表達出來。老總統喜歡嚴家淦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嚴家淦會講上海話，上海話和寧波話很接近，所以老總統一聽到上海話就高興得不得了。至於尹仲容等人，講的是湖南話等地方方言，光要聽懂就已經不容易，更何況老總統也不瞭解這些經濟學術語。但嚴家淦用上海話一講，老總統就統統聽得懂。嚴家淦之所以受寵信，這是很重要的原因。蔣夫人也同老總統一樣，與人私下談話時，她也習慣用上海話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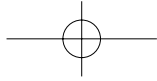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嚴家淦的手腕相當高明，不但老總統喜歡他，即便蔣經國和陳誠之間有利害衝突，但嚴家淦兩邊都應付得很好，扮演潤滑劑的角色。陳誠和蔣經國都很信任嚴家淦，主要就是因為他的手段很圓滑。但也因為手段圓滑，外面一般的印象認為他一天到晚在打太極拳，還幫他取了「嚴推事」的綽號，好像他都不做事。然而，這完全是誤解，事實絕非如此。嚴家淦很認真的在做事，而且有他自己的主張和堅持，至少在財經方面

是這樣。很多重大的稅制改革、外貿政策等都是由他決定的。他當過財政部長，對相關的政策非常內行，而且十分認真負責，一旦下決定之後，就會堅持自己的意見。這是我所認識的嚴家淦。

我曾經是嚴家淦的主要財經幕僚，當時財政部沒有什麼人才，人才都在經合會，因為經合會拿美援，待遇比較好。我是經合會主管政策的人，先後擔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和主管經濟計畫的第三處處長。1963年尹仲容過世之後，嚴家淦繼任美援會副主任委員，美援會改組為經合會之後，他以行政院長兼經合會主任委員，因此是我的頂頭上司。

我經常講，我在臺灣遇見兩位最聰明的人，一位是嚴家淦，一位是王永慶。我和這兩位天才談話，無論談什麼經濟問題，他們一聽就懂。每次開會時，嚴家淦更是尊重大家的意見，他本身的個性也很隨和。一般人的印象都認為嚴家淦不負責任、推託事情，那是錯誤的。

嚴家淦是我的老長官，我們相處得不錯，他也很欣賞我，但他的猜忌心頗重，所以對我的前途造成相當大的阻礙。我的上司包括嚴家淦等人都是大人物，但我對他們說話都不太客氣，我不懂官場規矩，和尹仲容犯同樣的毛病，



直言不諱，覺得他們講的不對，自己講的才對。正因如此，才容易得罪人。

三、蔣經國總統

蔣經國曾親自到我家找我談話。1967年，我到泰國曼谷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工業研究組工作，三年後（1970）被蔣經國召回。後來我和蔣經國相處非常不好，因為我常常寫文章批評他的經濟政策。壓抑我最厲害的，蔣經國也是其中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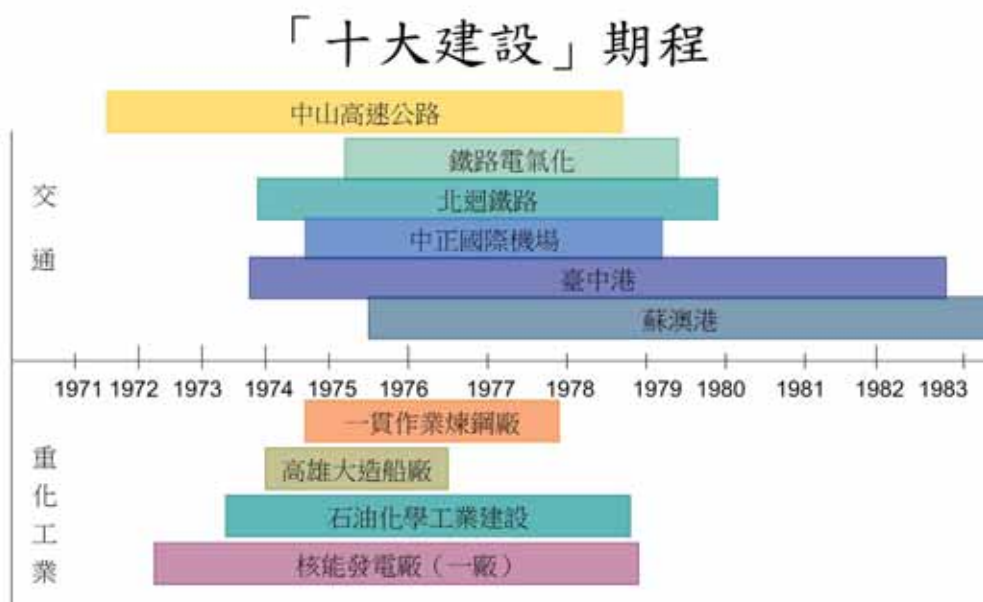
蔣經國在決策方面也學他父親，每次遇有重要的財經政策，都會先找財經要員開會，會後才做決定。這些財經政策都是由從前在經合會和我一起共事的幕僚事先擬定好，並由財經要員在會中討論，蔣經國若覺得結論沒問題，就照著稿子宣讀，之後即正式公布成為國家政策。是故蔣家兩代總統其實不像外界所批評的那樣乾綱獨斷、專制獨裁。

蔣經國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當權的時間很長，所謂當權不只是從擔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其實從他父親在臺灣復行視事，擔任總統開始，他就一直在幕後扮演操縱者的角色，蔣太子講的話，誰敢不聽？當嚴家淦年邁準備退下來的時候，蔣經國開始從幕後走到幕前，一步步由行政院副院長升任行政院

長，最後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九年國民教育是老總統任內的重要成就。至於十大建設，⁴大家都認為是蔣經國提出來的，其實不然，在蔣經國主政以前，這十大建設就已經有藍本了。十大建設只有三項是製造業，包括煉鋼、造船以及製造人造纖維等的石油化學工業；其他如核能發電廠、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蘇澳港、臺中港、南北高速公路和中正國際機場等都是公共工程建設。其實這些都是原本就有的規畫，行政院召開院會時，大家就曾分別討論過這些工業建設和公共工程該如何進行。當時蔣經國聽了之後靈機一動，要我們乾脆湊成十項，名稱就叫「十大建設」。但湊來湊去，始終湊不滿十項，只有九項，最後是把蘇澳港也納入其中，才勉強湊足。蘇澳港是一個小漁港，港邊還有一部分是做為軍事用途，所以只是一個小軍港兼漁港，這麼小的工程哪能算得上是十大建設之一？最後沒有辦法，只好把它納進來，湊成十項。這就是「十大建設」的由來。

4 十大建設係指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所推行的十項國家級基礎工業建設和公共工程。包括南北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西部縱貫鐵路）、北迴鐵路、中正國際機場、臺中港、蘇澳港、大造船廠（中國造船公司）、大煉鋼廠（中國鋼鐵公司）、石油化學工業、核能發電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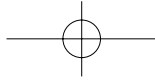


包括十大建設在內，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蔣經國是主要的關鍵人物，從他擔任行政院長（1972.6-1978.5）開始，臺灣經濟快速起飛，經濟發展的重心從農業轉向工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從此臺灣正式進入工業化階段，商業也隨之蓬勃發展，逐漸邁向經濟現代化。現在我已經記不清楚如何實踐相關事務的具體細節了，而當年我們身在其中且參與其事，故也識不得經濟發展的全貌，因為它是一個進行式。

然而，我很清楚臺灣經濟發展的整個脈絡：政府遷臺初期是先求經濟穩定，其後再從發展農業經濟轉變為發展

現代工商業經濟，而這個性質轉變就是從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開始的。當時有一個口號是「工業回饋農業」，之前農業曾經幫助臺灣經濟發展，也就是以「農業培養工業」，工業帶動起來之後，應該回過頭來幫助農業。再者，臺灣的工業發展早期是以輕工業為主，如紡織工業等，後來轉型為重工業，也就是朝現代工業發展，例如造船、煉鋼等，這些都發生在蔣經國主政時期。

在蔣經國執政的後期，臺灣經濟發展又經歷一次重大轉變。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任內（1978.5-1984.5），李國鼎可說是功不可沒，他看準了電子工業的



王作榮先生（右三）與經濟學者參觀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王作榮先生提供）

前瞻性，開始推動臺灣發展資訊科技產業，我們稱之為現代科學工業，這些都發生在蔣經國執政後期。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稍後還會再談到。

四、李登輝總統

最後是李登輝，他和我差不多有四十年的交情。最初跟李登輝打交道時，他是中美共同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⁵農業經濟組的技正，相當於專門委員，職級不高。他是我一手

向蔣經國推薦的，之後我又極力協助他加入中國國民黨，我們夫妻和李登輝、曾文惠伉儷也都有私人交誼。剛開始李登輝還有點信任我，但這四十年的交情後來還是搞翻了，我們兩人的關係變得很差。

李登輝自認是經濟專家，雖然他學的是農業經濟，其實並不真懂經濟。李登輝剛擔任總統時的主要幕僚就是我，後來我們逐漸疏遠，之後我就不清楚他還用過哪些人，只知道他慢慢走向臺獨的道路。

貳、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

5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The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JCRR），1948年10月成立，為中美雙方合組的合作機構；蔣夢麟、沈宗瀚、李崇道先後擔任主任委員。



王作榮先生暨夫人范馨香大法官與時任臺北市長的李登輝先生合影（王作榮先生提供）

一、陳誠

推動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政治人物除了以上幾位總統之外，還有一位關鍵人物，就是陳誠。陳誠長期擔任行政院長，也當過副總統，雖然終究沒有當上總統，但權力還是很大。⁶陳誠也是學老總統蔣中正的作風，在行政院長任內，雖未邀集學者參與辯論，但要官員之間互相辯論。財政部、經濟部、中央銀行和內政部等部會的意見經常不一致，當時的部會首長和現在不同，都很自負，也很有主見。例如尹仲容、楊繼曾、徐柏園等人的個性都很強，經常堅持己見，一定要照他們的意思去做。每次開院會，各部之間就吵得不可開交，爭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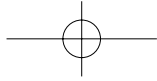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一塌糊塗，不像現在開院會都鴉雀無聲。只要是與財經有關的議題，相關部會都吵個不停，彼此互不相讓。

陳誠也是軍人出身，但他的智慧和威望沒有蔣中正高，所以無法約束，只能任由各部會首長在院會中互相爭執不休。爭吵時，他閉目靜坐充耳不聞，吵到最後接近中午12點，也就是要散會各自回去吃飯的時候，他突然睜開眼睛說：「你們吵了這麼久，結論到底是什麼？總得給我一個結論，不能吵了半天沒有結論。」他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各部會首長一聽，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吵了半天總要有結論，不能吵完散會各自回家，而視院長如無物。最後，這些首長沒有辦法，只能恭恭敬敬的彼此讓步、互相討論，匆匆忙忙的協調出結論來，並向院長報告。陳誠也很乾脆，直接宣布照這個結論辦理。就這樣做出決策。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陳誠等人的決策風格和方式，相當有趣。雖然議論的都是國家大事，但決策者卻像小孩子做事一樣，等大家吵完後，才匆忙得出結論，然後照結論執行。

我是負責幕僚工作，從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1953-1956）開始，我就

⁶ 陳誠（1898-1965.3），中華民國第二、三任副總統（1954.5.20-1965.3.5）、第五任（1950.3-1954.5）及第七任行政院院長（1958.7-1963.12，以副總統兼）。



參與其中。一開始我是負責第一期四年計畫工業部分的設計，到了第四期四年計畫（1965-1968）我已經升為總設計人，所以多少知道這些內幕。

二、黃金十年的政府重要財經組織和人才

1953年到1964年是我為政府服務的黃金十年。我是1953年進入經安會，當時經安會下設四個小單位，前三個單位的英文名稱分別是Committee A、Committee B和Committee C，分管農業、金融、財政等，另外還設了一個「工業發展委員會」，英文名稱稱為IDC（Industry Development Commission）。經安會的其他三個單位都稱Committee，也就是委員會，只有工業委員會稱為IDC，為何不稱Committee D？因為在經安會成立以前，有一個重要單位「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⁷成立於1949年，1953年由工業委員會接替生

管會的工作，生管會原來的人馬全部歸入工業委員會。尹仲容原本在生管會任職，這時也轉到工業委員會。

生管會屬於臺灣省政府，省主席吳國楨兼任生管會主任委員時，副主任委員就是尹仲容。尹仲容個性很強，也很急，而吳國楨對經濟事務較不感興趣，也弄不清楚，所以生管會每次開會碰到問題時，尹仲容就告訴坐在旁邊的吳國楨：「這件事你不知道，我來說明。」副主任委員反而搶了主任委員的權，但吳國楨也求之不得，乾脆坐在一旁默不作聲，讓尹仲容當家。

工業委員會在1953年9月成立，實際負責的尹仲容也轉任工業委員會的召集人。我就是受尹仲容的延攬而進入工業委員會擔任專門委員，從那時開始，一直到1963年，我在工業委員會總共服務了十年，由於我跟李國鼎處不來，所以後來改調顧問。1958年，工業委員會併入美援會，1963年美援會又改組為經合會，這十年內改了好幾次名稱，但我的工作和薪資都沒什麼改變。在這十年期間，我的主要工作有三：首先是負責經濟設計和經濟計畫，其次是替長官準備資料和對外發表的文稿，最後則是向長官提供政策建議，因此有許多重大政策都有我的意見參與其中。在我的一些

7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成立於1949年6月，任務是統一管理臺灣的公營事業（國營、省營、國省合營），負責規劃或審定、主導或協調各事業的經營管理及生產業務，後來逐漸擴展至民營企業的輔導及金融貿易的決策；主任委員由省主席兼任（陳誠、吳國楨、俞鴻鈞先後任之），副主任委員尹仲容為實際主事者，該會雖然隸屬臺灣省政府，權力卻凌駕於中央財經部會之上。1953年7月，「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成立後，為了統一事權，遂將生管會及其他財經機關加以裁併。

著作中也有提到，包括「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獎勵投資條例」等。「獎勵投資條例」雖是李國鼎的投資小組在1960年所提出的，⁸但大部分內容都是脫胎自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而且其中有很多後加的意見我是不贊成的。

在那個時代，財經方面的決策重心是在尹仲容、嚴家淦和楊繼曾等人。尹仲容和楊繼曾是學工程的，嚴家淦是學化學的，所以他們都不太懂經濟，就我一個人在那裡包辦經濟方面的事務，他們都很信任我，讓我一做就是十年。

在執行第三期四年計畫（1961-1964）之前，美國準備停止美援。美方覺得臺灣不能老是依賴他們，應該要自立，所以要我們提出計畫，對財政金融的改革與經濟發展的設計，都要拿出一整套的計畫和政策建議，然後把計畫書送到華盛頓，由美方批准之後，幾年內，美援就要停止了。基於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駐華安全分署」（以下簡稱「安全分署」）的要求，⁹我奉命在

1959年草擬了一份「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而為了加速經濟發展，相關財政、金融等各方面必須配合改革，就此我再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這兩項工作是配套提出的，一方面是計畫，一方面是實施計畫的政策。到了1965年之後，美援就停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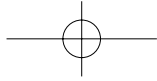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在這十年的參與過程中，我得老實講，一來我的個性有點強，二來我不懂官場的規矩，既然長官要我參與，我就全力以赴，結果鋒芒太露，每個人都討厭我，而且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裡搞，一搞就是十年，最後待不下去就走人了。現在回想起來，我也有點犯了尹仲容的毛病。

然而，這黃金十年是我非常得意的十年。就臺灣經濟發展的分期而言，在1953年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成立之前，臺灣經濟其實已經穩定了，但我們還是成立了所謂的「經濟安定委員會」，當時我還問我的長官，既然經濟已經穩定了，為什麼還要成立經安會？我猜大概是美國人的建議。當時主持經濟安定的主要負責人是俞鴻鈞、徐柏園

8 1959年12月，美援運用委員會下設「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由秘書長李國鼎兼召集人，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如何改善國內投資環境。

9 1957年，美國設立開發貸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與「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U. 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並行，後者主管贈與款項，開發貸款基金則負責對經濟建設計

畫貸款；1962年，以上二機構合併，成立「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駐華美援分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 S. Aid Mission to China）。1957年以前，美援以無償贈與為主，之後改以貸款為主。



和任顯群等人。

第一期四年計畫開始的時間是我建議的，也就是從1953年開始。在這之前，我們都是在打爛仗，物價天天漲、年年漲，物價一漲，我們就手忙腳亂，根本沒有時間顧及經濟的長期發展。所以當時行政院長陳誠嘆了一口氣，說：「現在局勢終於安定下來，我們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來從事長期經濟發展計畫。」陳誠講這句話時的神情，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這十年的經濟發展，我是全程參與的，包括工業發展計畫、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等，統統都是我草擬的。

三、美援及美國安全分署的角色

當時美國負責美援事務的駐華單位是「安全分署」，美國安全分署的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涉及美援的問題更是如此。分署署長Haraldson (Wesley C. Haraldson, 中譯名「郝樂遜」) 本身就是經濟學家，又喜歡管事，我們也對他非常尊重，所以他常常零星地對我國經濟措施提出他的修正意見，今天提一點，明天提一點。而且Haraldson提出建議後，我們非照他的意見去做不可，因為申請美援需要經過他的簽准，如果他不簽字，這一項經費就不能動用，所以我們都很尊重他。

剛才提到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其中有八點就是出自他的建議。我們為何會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其實當時我們已經看到政府在財經方面有哪些問題需要改革，而Haraldson對我國財經改革也有他自己的意見。有一天，他給了尹仲容八點財經改革的建議，¹⁰ 尹仲容轉交給我。我拿到這八點財經改革建議，忽然靈機一動，我們本來就已經提出多項改革方案，不如全部合併起來，總共二十一條。後來我們一想不對，當初日本人要和我們訂的不平等條約剛好也是二十一條（1915年1月），現在我們自己還提出二十一條財經改革措施，一聽就令人很不愉快。因此，我再整併成十九點，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就是這樣來的。

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擬好之後，需要獲得安全分署的同意，否則申請不到美援，所以我們同時也向美國提出「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並說明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是為了執行加速經濟發展計畫而配套提出的。提出之後，當時幾位決策者經過一番討論，覺得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需要有法律依據。既然要有

10 Haraldson的八點建議包括：軍費應有限額、採行防止通貨膨脹的金融及放款政策、改革稅制、實施單一且切合實際的匯率、放寬外匯限制、設立公用事業費率委員會、設立證券交易所、公營事業移轉民營等等。

法律依據，就必須送請立法院審查通過。當時我清楚聽到嚴家淦說：「不要去碰立法院，一碰立法院，意見就會多得不得了，而且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利益關係。一旦提交立法院，某委員加一點，另一位委員又加一點，接不接納都會產生很多問題，最後事情一定沒完沒了。」所以最後由行政院成立一個小組，針對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進行充分討論後，再送行政院會議決，這樣就有法令依據了。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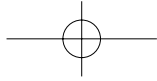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但小組的召集人要由誰來當？陳誠沒有時間，而且也是外行，最後決定由副院長王雲五擔任召集人。當時每隔一到兩週都要開一次會，討論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和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的內容、進度和執行狀況等，十分認真。王雲五是個生意人，他還要打分數，我們都笑翻了。開會時我的意見比較多，因為這些措施多數是我草擬的，我很瞭解。但開了一、兩次會之後，突然間他們就不

讓我參加了，把我排除在外，由他們自己去搞。這些往事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歷歷在目。

美國對我國政府遷臺後的財經政策確實具有影響力，但都是在剛開始時，主要是美援停止以前。美援終止後，安全分署也就撤銷了。在此之前，我們非常尊重他們的意見，因為要美援必須透過安全分署，如果不聽他們的意見，就拿不到美援。剛才也提過，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就有八點是出自安全分署署長Haraldson的建議。同時安全分署也設立經濟研究組，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特別做了有關臺灣的各種經濟統計，如國民所得、經濟成長等方面，他們另有一套統計資料。這些統計資料彙整好後，會直接送到美國國務院和援外單位，從而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安全分署將這些資料密藏，不讓我們知道，雖然我們天天設法打聽，希望能看到這些資料，但始終無法得見。

當時美國援華可分成兩部分，一是政策方面的貢獻，另一則是技術方面的援助。我們的經費掌握在他們手中，每年平均大概有1億美金的經援，所以在政策方面當然必須言聽計從，美國在這方面設有經濟研究單位。在技術援助部分，美國成立顧問公司，最主要的顧問

11 1960年1月，「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經總統蔣中正親自核准後，即由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提交行政院院會通過，但未完成立法程序，是故其性質與歷次經濟建設計畫相似，屬於政策性宣示的政府內部文件。而它又是一項總統批准的行政命令，卻在執行上不具有較強的法律約束力，所以當時在行政院內設立監督執行小組，按月開會檢討進度，每年提出總檢討報告。因為層峰的支持，「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決定了往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大部分財經機關也以此做為施政依據。



公司是「懷特工程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專門進行技術指導。那時我國在工業等方面的技術還很落後，所以像王永慶的臺塑以及肥料廠等都是美方幫忙建立起來的。

四、財經學者的影響有限

當年臺灣相關經濟理論和知識非常落後，在臺灣懂得將總體經濟學應用到經濟實務、經濟決策和經濟設計上的，我是開風氣之先者，這些都可以找到資料證明。我是臺灣第一位懂得將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總體經濟學應用在經濟發展實務上的。那時學校裡所謂的經濟學者可能聽都沒聽過什麼是「凱因斯」？

1967年，蔣中正總統特別在梨山行館宴請海外學人，並召見他們舉行會議，劉大中、蔣碩傑、費景漢和顧應昌等學者共同提出一份報告(即1967年7月的「改進經濟政策要點」)，做為對財經政策的建言。這份報告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內容，其中提到的預算改革、總體經濟等都是我們老早就在進行的，我曾為文指出這些都是想當然耳的論點。這些書呆子從來不在國內從事實際工作，對國內事務也不是很瞭解，自然提不出多好的意見。

蔣碩傑的專長是經濟理論，但不懂計量經濟和經濟計畫；劉大中則長於國民所得的計算和計量經濟學的應用，但缺乏基本理論的基礎。所以蔣碩傑遇到不懂的計量問題就經常找劉大中討論，而劉大中遇到不懂的經濟理論，也會找蔣碩傑商量，彼此配合得恰到好處。

叁、臺灣經濟發展之路

國家是一個整體，內政、教育和經濟等問題都是息息相關的。剛才提過，在臺灣經濟發展的道路上，老總統、嚴家淦和蔣經國等人都有十分重大的貢獻。他們的貢獻主要不是知識上的貢獻，而是權力上的貢獻，因為有權力，他們才能推動各種事務。其餘像政府遷臺初期的俞鴻鈞、徐柏園、楊繼曾、尹仲容、李國鼎和孫運璿等人也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些人有個性又能幹，而且都是與總統關係良好、深得總統信任的人，所以講話一言九鼎。此外，俞國華也算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個性溫和，是總統的家臣，大家都知道他的父親俞作屏與老總統的關係。然而，相較於俞鴻鈞、尹仲容等人，俞國華在財經界的聲望和貢獻都略遜一籌。在財經方面真正推動臺灣經濟發展的關鍵人物，還是剛才提到的這些人。

1953年以前，我們的重點是謀求經濟安定及抑制通貨膨脹，當時通貨膨脹得很厲害。那時是陳誠主政的年代，首要工作就是穩定臺灣經濟，在他下面的吳國楨、任顯群、俞鴻鈞和徐柏園等人在這個階段都有很重要的貢獻。

1953年經濟穩定之後，才開始有計畫的從事經濟發展，最初的重點是放在農業，先從土地改革著手，如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然後再進行農業生產技術改良、農地重劃等，逐步向前推進。當年的口號是「農工並重」，農業和工業就好像車子的兩個輪子，那個年代臺灣的汽車還很少，汽車有四個輪子，而普遍使用的是小推車，長得很像三輪車，但只有兩個輪子。當時的主政者已經注意到必須農工並重，這樣經濟才能穩定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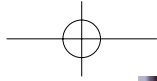
在這個階段我們推動了四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以及後來的十大建設。我覺得第四期四年計畫是設計最完善的經濟計畫，在當時頗受層峰重視，但到後來時間一久，主政者也就疲乏了，這類事情也慢慢的不被重視，設計也沒有當初在我負責的時候那麼認真了。經濟計畫逐漸不受重視的另一個原因是，那時臺灣經濟已經穩定下來，而且開始繁榮起來。當時我們天天注意的問題就是

「臺灣經濟起飛了沒？」我們如果有機會遇到在臺灣的外國人，例如在與安全分署的人討論時，都會問他們是否覺得臺灣經濟已經起飛了？他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推算起來，這個時間差不多是民國40幾年到民國57、58年前後，也就是1960年代左右，他們認為臺灣經濟不但老早就起飛了，而且發展得很好。由於經濟已經發展，主政者就不大注意這些問題。

我在1963年前後離開經合會，離開前完成了第四期四年計畫的設計，其中已經提出重工業的發展，包括大煉鋼廠、機械、造船和汽車工業等。但當時沒有那麼多經費，所以只是擬出一份計畫，希望能逐步實現。慢慢的臺灣經濟真的發展起來了！

臺灣經濟轉型的轉捩點，正如前面提到的，大概是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期，當時政府開始大規模的推動經濟發展計畫，並不一定按照我們之前的規畫按部就班的去做，而是視其重要性一項接一項的立即進行。例如主政者認為鐵路電氣化、南北高速公路很重要，就納入十大建設，直接著手發展。

從蔣經國執政開始，臺灣經濟發展從農業轉向工業，後來的重心又朝重



工業發展。發展重工業必須要有配套措施，主要是公共工程建設，如電力開發、鐵路電氣化、高速公路等，這是臺灣經濟發展的第一次大轉型期，時間大約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到了十大建設完成之後，臺灣經濟已經成功轉型為現代化工業經濟。

在蔣經國即將過世前的那段時間，臺灣由現代工業經濟進入資訊科技經濟，這是第二次大轉型期。這個階段的主導人是李國鼎和孫運璿，他們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注意到電子工業的發展，看到科技產業在臺灣的未來性。我記得當時政府準備花100億元購買一套電子加速器設備，我們知道後嚇了一大跳，100億元現在來看自然不是問題，但在當年卻是天價。李國鼎和孫運璿堅持一定要購買這套可以帶動臺灣科技產業發展的機器，如果不買，經濟發展就會落後。套句蔣經國的名言「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最後我們真的把這套機器買回來，電子化就是從那時開始發展到現在。

過去的經濟發展是一步步、階段性的往前邁進，過程清楚分明，我以前連年代都如數家珍，現在有些細節已不復記憶，但每個階段的發展重點我還是記得很清楚。臺灣從最初期的穩定經濟，再到發展農業，如推動耕者有其田、農



王作榮先生擔任監察院長期間（1996-1999）留影（王作榮先生提供）

業技術發展和農地重劃等；後來開始發展輕工業，等到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基礎，我們就著手發展重工業和公共建設，臺灣工業邁進現代化階段，並在1980年代再次轉型為資訊科技經濟，一直延續至今。

同時，教育也是配合經濟的逐步發展，進行階段性的改革，首先是設法提高教育程度，例如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大學教育則注重科學研究等，這都是搭配實施的。

經由逐步漸進和配套發展，臺灣才有今天。但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提臺灣經濟應該何去何從了，政府也迷失了方向。我在擔任政府幕僚時，每天都有新的觀念，每天都在發掘新的問題，同時也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如今我已經沒有精力再去提這些事了，提也沒有人理會，目前的政府已經沒有人在做這些事了，想起來真是令人感慨。